

“辩学”——颜元哲学思想体系内在理路的开端

傅济锋

(苏州学院 基础部 江苏 苏州 215104)

摘 要 颜元哲学是一个有着内在理路的思想体系。这个内在理路始于“辩学”对问题的提出与辩驳,经由“明道”之论证,最后落实于“致用”。其中,“辩学”是颜元循着“东林”以来理学批判的余绪,在“经世致用”时代精神的导引下,反思晚明以来“反王尊朱”的学术趋向而根本否定理学,倡导复兴周、孔“习行六艺”之学、教,从而展开其全部学术批判与建构的逻辑起点,这是其哲学思想体系构建的内在理路的开端。

关键词 辩学;内在理路;开端;颜元哲学

中图分类号 B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2-0005-04

晚明以降,王学末流空疏学风直接激起东林学派以“反王尊朱”的学术主张揭橥理学批判的大旗,得到了学界广泛呼应,逐渐汇聚成了反对空虚无用学风、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潮。此一思潮在清初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家国巨变、朱子理学再度被尊崇,刺激了学者深刻反思造成明亡的学术根源。“明亡于学术”是当时学界普遍的共识,如陆陇其曾言:“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1]但这一反思却在清初衍变为朱、王学术是非之争,当时学者如顾炎武等多归咎于王学,间或有如孙奇逢主张调和。在反思明亡之学术根源的路向之外,有学者返本求源,追寻儒学经典根本以“明经达道”,故经学考据逐渐兴起,加之清初文化政策(即“尊儒重道”及文字狱)的影响,有清一代竟成为显学。此种格局之下,学界切于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或从义理、或从经典文本探求挽救民族国家危亡的救世良方。但颜元不由义理而折入经学考据^{[2] 20-23},坚持儒学经世致用传统的为学宗旨,将朱、王学术以及经学考据皆视为不切世用的空虚学术,而展开学术批判与建设。其“辩学”即是以批判理学的为学之误作为重点而深究学术实体实用之社会责任,这是颜元严厉批判朱子理学及一切空虚无用学术的学理依据。通过批判空虚无用的理学,显明周、孔正学,进而昌明儒学经世致用之宗旨即在“习行六艺”之道,指出“道”乃“道在六艺”之“道”、“道即礼”,揭示出儒学正道之所在;由此倡导复古“习行六艺”之学、教,以“学、教、治一

致之道”贯彻于经济民生的实践,以复古“礼治”为拯救民生世道的良方。颜元一生的学思活动都是循着“辩学”、“明道”、“致用”这一内在逻辑理路展开,由此将其整个学术思想贯穿起来,形成了一个有较为完整的内在逻辑体系,而“辩学”乃其内在逻辑理路展开的第一步。

一、根本否定宋、明理学空虚无用之学风

如前所述,晚明以来理学批判思潮至清初逐渐转变为门户义理是非之争,在反思明亡之学术思想根源这一历史背景下,学术之是非的辨正,无疑直接关系到学术之于社会治乱兴衰责任的担当。这也如顾炎武所倡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何从学术思想的层面探究解决晚明社会衰亡的问题,成为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理论课题。颜元对朱、王学术根本否定,其中尤以朱子理学为主要批判对象。其直接原因是,颜元认为在明亡清兴的历史背景之下,朱、王两派学术均未能有效地担当起安顿世道人心、应对社会危机的责任,其中尤以程朱理学为甚。在明亡这一严重历史事件的责任追究上,理学家们囿于门户、相互诋责,直接激起了清初倡导经世致用的儒家诸学者对理学的厌弃。颜元就曾描述当时情形道:“为朱者曰:我真孔子也,凡不由朱者皆斥之。为陆者曰:我真孔子也。凡不由陆者皆斥之。吾乡孙钟元先生又以合朱陆而成其为真孔子也……至今日之为朱、陆者,则丝毫之礼、乐不行,全幅之僧、道自

任 而犹蜺然以孔子自居 哀哉！此辈不惟孔子伤之 恐三千徒众之未犹当吐弃之也！^{〔3〕134}

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此种诋责情状深深刺激着颜元等人反思学术之是非问题，由此直接跳出门户之外，俯瞰这一学术怪象，对理学整体作出根本否定，断言“两派学辩，辩至非处无用，辩至是处亦无用。”两家之是非总可勿论，直追三事、三物，学而偏者贤，全者圣，一切故纸堆，宜付祖龙矣。^{〔3〕193}颜元与弟子李縠言“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3〕196}道出其学术批判以是非为标准的立场。对此，梁启超的评价是：“若颜氏者，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而其卒不显于清世。”^{〔4〕19}钱穆先生也评论说：“言夫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颜元要为巨擘矣。岂仅于三百年！上之为宋、元、明，其言心性义理，颜元既一壁推倒；下之为有清一代，其言训诂考据，颜元亦一壁推倒。‘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王绳语，见《居业堂集》卷八《与纘梁仙来书》）遥遥斯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可以为颜元咏矣。”^{〔5〕198}

颜元根本否定宋、明理学，并非只是出于某种反感的心理，而是源自他对清初以来理学发展背离儒学传统及其危害的判定，而竭力护卫和复兴儒学传统。在《未坠集序》中颜元曾交代了他对朱学的觉醒。在39岁归宗后他已知“圣人之道绝传”了，却不敢也不忍与宋儒决绝，而欲“扶持将就，作儒统之羴羊”。然而他58岁到中州游学却见“人人禅宗，家家训诂”，误以宋儒为真孔、孟，方决心“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3〕397-398}。

颜元自幼为学追求圣人之道，曾以为程、朱、陆、王之学乃圣人之道之所在，但最终统统否定了。为何呢？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根本原因在于他逐渐认识到陆、王、程、朱学术俱非孔孟正宗，其所倡导的性命天理之学根本无法救世济民。之所以如此，颜元认为主要是因为宋、明理学为学宗旨与功夫上背离了儒学传统。他曾指出：“（朱子）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工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授受，以释经注传、纂集书史为事业……王子以致良知为宗旨，以为善去恶为格物，无事则闭目静坐，遇事则知行合一。”^{〔3〕13}

颜元认为，无论是朱子或王子，其为学都不过是离事物以言理、于事物之外求性善，那么“原以表里精粗，全体大用，诚不能无歉也。”故其离事物而空谈

性命天理、弃人伦日用而究为学功夫，亦不过是蹈空践虚而以空言乱天下而已！不但不合于儒学经世济民、利济苍生的经世精神，而且长此以往反致学亡道丧、乾坤湮晦！不但败坏学术、人才，最终会败坏国家，涂炭苍生！所以颜元立意与程、朱无用学术决裂，而职志于复兴孔、孟实践实用之学、教。可见，颜元断定宋、明理学为无用学术是基于对其为学宗旨与功夫两个层面的批判得来的。

二、对宋、明理学为学宗旨与功夫的批判

颜元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也就从针对理学为学宗旨和为学功夫两个层面展开。

从为学宗旨而言，众所周知，“理学”“心学”的分际只是源于探究“天理”如何落实于“性命”，亦即如何安顿“天理”于“人”“心”这一共同的问题上发生的。二者均以“天理”为先验的存在，而不论是“格物穷理”还是“致良知於事事物物”，都不外乎以达于“天理”本然之至善为“性命”功夫，都不否定“理在心中”。所以，颜元对理学的批判也是从分疏心性义理入手。如《习斋年谱》记载，颜元31岁时，张石卿就曾与他讲过“性皆善，而有偏全厚薄不同故曰‘相近’。义理即寓于气质，不可从宋儒分为二。”这大概是颜元接触心性义理的问题较早的一次。33岁时，颜元始辩性善、理气一致问题，觉宋儒之论不及孟子。34岁居养祖母丧时，觉朱子《家礼》有违性情，与古《礼》相异，终悟理学并非周、孔正学。钱穆先生评颜元“不从心性义理上分辨孔孟、程朱，而从实事实行为之分辨，此梨洲、亭林、船山诸家所未到。颜元谓即此是程朱、孔孟真界限，其实即此是颜元论学真精神也。”^{〔5〕178}谓颜元不从心性义理分辨孔孟、程朱，显然非是，而谓以实事实行来分辨，并说这是程朱、孔孟真界限，其乃颜元论学真精神，却是不刊之论。

至于颜元是如何从心性义理上分辨程朱、孔孟，本文基于文理仅作简略陈述。颜元主要是否定了宋儒“理”“气”对立的观点，从而否定其认“天理”之本然之性（“天命之性”）善，而把恶归之于“气质”，及“气偏性亦偏”而以“变化气质”的功夫达于本然至善之“天理”等错误观点。在此基础上，颜元提出并论证了“理、气一致”的观点，进而论证了“理、气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3〕18-49}由“理、气一致”得出“性、形不二”的结论，亦由此从本体论论证进入人性论的建构，提出并论证“性即气质之性”，进而提出“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

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3〕}基本上确立了“气质性善论”的观点,也在根本上否定了宋、明理学基于“理在气先”本体论的“气质性恶论”,从而为随后批判理学为学功夫打开了通路。

从为学功夫而言,颜元的批判就更具体翔实了。颜元基于宋、明儒因认为“理”之本然之性善而“气质之性”有偏恶,故主张“变化气质”,以静坐读书为“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的落实,或者干脆“直接体认性天”为简易直接的功夫,最终都不可避免落入“离事物以言理”的蹈空践虚、空疏无用的格套,逐渐养成离事物而言理、弃人伦而言性命的静坐读书、空口玄谈的风气。颜元对此给予猛烈批判,他指出:“盖闭目静坐,读讲著述之学,见到处俱同镜花水月;反之身,措之世,俱非尧舜正德、利用、厚生,周孔六德、六行、六艺路径。”^{〔3〕93}

静坐读书不唯背离周孔学术之正途,而更严重的是这种学风造成灭儒道、坏人才、害民生、误乾坤的大坏疽,故颜元厉言其病使人“终身不晓习行礼、义之事,至老不讲致君、泽民之道,且无一人不弱不病。灭儒道,坏人才,纔世运,害殆不可胜言也。”^{〔3〕78}这无疑会造成学亡道丧、乾坤湮晦的大悲剧——宋、明以来亡于异族的历史就是无可辩驳的例证。也正有见于此,颜元猛烈批判理学静坐读书、空口玄谈的为学方法及其脱离实践的空疏无用的学风。颜元认为之所以如此,在于汉、宋以来儒者错误地理解了周、孔为学之删述方法,造成为学方法之误,并由此误丧了周、孔之习行经济之学,亦误了周、孔之圣道。颜元指出:“汉、宋来道之不明,只由‘学’字误。学已误矣,又何‘习’?学习俱误,又何‘道’?……然汉、宋之儒,亦不意其祸世误民至此也,亦非有心叛故道、开新辙以为异也。但见孔子叙《书》、传《礼》、删《诗》、正《乐》、繹《易》、作《春秋》,不知是裁成习行经济谱,望后人照样去做,却误认纂修文字是圣人,则我传述注解是贤人,读之熟、讲之明而会作书文者,皆圣人之徒矣,遂合二千年成一虚花无用之局,而使尧、舜、周、孔之道尽晦。”^{〔3〕74}

颜元指出,汉、宋儒误认了为学之方,造成了学亡道丧的严重后果,教训不可谓不惨痛!这也是宋、明以来社会衰弱的源头。故颜元据此指出,读书讲学只是致知之一事,并非周孔正学所在。

三、倡导复古周、孔“习行六艺”之正学正道

颜元基于历史事实与对理学在为学宗旨与功夫

两方面的论辩,揭示出理学之所以不能有效应对社会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其背离了周、孔正学正道,因此对理学作了根本否定。而否定的同时,颜元也为维系世道人心、担当社会治乱兴衰责任寻找到了他所认定的“正学”,即周、孔“三事”、“三物”、“六艺”之学。

颜元肯定了周、孔学术实体、实用、实践、实行的品格及“经世致用”的宗旨。他指出:“粤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气机者,率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3〕7}

颜元深信三代古圣为学秉持“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之经世实学,造就了民安物阜理想社会,而古圣儒者经济天下、利济苍生的职志,底定了孔、孟以前古圣为学崇尚务实的学风。这一点颜元在给钱晓城的信中已明白指出了,他说道:“夫儒者学为君相百职,为生民造命,为气运主机者也……儒之处也惟习行,故孔子开口便云‘学而时习之’、‘庸德之行’。儒之出也惟经济,故‘大学之道’、‘惟’明德、亲民、止至善’,诸如‘用之则行’、‘为东周’、‘三年有成’、‘颜子为邦’、‘繹子霸王之佐’、‘子路治蒲’、‘言子’治武城’、孟子名世‘舍我其谁’,皆确证矣。”^{〔3〕40}

颜元基于“气机主于学术”的认识,指出以儒者为天地之元气、“气运主机者”,是“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才,以辅世泽民,参赞化育故也。”^{〔3〕9}故自古以来儒者为学涵养不离于“习行”,其志在“经世济民”,这正是周、孔以来学、教实践实行的品格之所在。然而其学、教涵养之具是什么呢?颜元于此提出了“六艺”说。

颜元认为,古圣之学、教皆在六艺。他曾言:“古者学从六艺入,其中涵濡性情,历练经济,不得躐等,力之所至,见斯至焉。”^{〔3〕64}“三事、六府,尧、舜之道也,六德、六行、六艺,周、孔之学也。古者师以是教,弟子以是学,居以养德,出以辅政,朝廷以取士,百官以举职。”^{〔3〕401}

颜元认为,三代、周、孔教学以六艺为内容,所谓“三事”、“三物”最终都落在“六艺”之学、教上。正如李縉所言“先王三物之教、六德、六行,其实事只在六艺。质之圣训,固彰彰也。”^{〔6〕10}颜元认为:“盖三物之六德,其发现为六行,而实为六艺。”^{〔3〕71}颜元反复强调学、教不外乎“习行六艺”,认为除此之外皆非正学。如颜元尝言“吾凡与朱、陆两派讲学先生言周公、孔子三物之道,即言以六艺入手,渠亦不是果志道据德依仁了方学艺,只艺学是实下手功夫。”^{〔3〕92}又说“学者学为人子,学为人弟,学为人臣

也。学自六艺为要。^{〔3〕624}故“学者,士之事也,学为明德、亲民者也。孔门教人,以礼、乐、兵、农,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为正学。”^{〔3〕730}颜元确认“六艺”之学乃周、孔之正学。

至此可见,颜元从古儒为学之宗旨与学、教之内容两个方面确证了儒学正学之所在“六艺”,其为学功夫在于“身心道艺、一致加工”之“习行”。而且由此颜元对宋明儒“格物论”作了全新的诠释,指出“格”乃“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义,即孔门六艺之教是也。”^{〔3〕491-492}故吾断以为“物”即三物之物;“格”即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格。此二格字见古史及《汉书》。^{〔3〕159}故恕谷概括道“格物非他,即学习六艺以成其德与行。”^{〔7〕123}

颜元从针对理学的批判中辨正了儒学正学之所在,接下来就是“明道”的问题了。“辩学”作为其学术思想内在逻辑理路展开的开端,清楚地包含着批判与建设的两个方面的内容,积极地回应了明末清初学界关于儒学近代转型问题的种种学术主张,明确提出了倡导复兴周、孔“习行六艺”之学、教乃儒学

近代展开的新形态的主张。尽管颜元倡导复兴的“六艺”之学、教内容上远超过三代时期的“礼、乐、射、御、书、数”,也依据时代的需要增添了诸如“兵、农、水、火、工、虞”等内容,但是否真正能够挽救世道人心?是否真正解决中国传统社会重道德、轻知识的状况?或许在颜元这里还需要对“六艺”之学的内容作更进一步的改造才行。然而,无论如何谁也无法否定他主张以“习行经济”之实学取代“静坐读书”之虚学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陆陇其. 三鱼堂文集[M]. 刻本. 清同治戊辰.
[2] 余英时. 论戴震与章学诚[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3] 颜元. 颜元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4]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5]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6] 李纛. 圣经学规箴[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
[7] 王源. 居业堂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简讯 ·

第二轮(第一批)全国高校一级学科评估排名揭晓 河海大学 8 个学科位居前列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3 月 15 日公布的第二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第一批 31 个一级学科的评估结果显示,河海大学有 8 个学科的排名进入江苏省前四位并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公共管理学科在江苏省排名榜首。河海大学 8 个学科的排名情况见表 1。

表 1 河海大学 8 个学科的排名情况

学 科	江苏排名	全国排名	学 科	江苏排名	全国排名
公共管理	1	13	管理科学与工程	3	16
农业工程	2	9	电气工程	4	20
力学	2	2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33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3	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4	35

第二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工作于 2006 年 5 月启动,将用 2~3 年时间完成。评估采用主观与客观结合、以客观为主的指标体系,客观指标包括“学术队伍”、“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反映该学科的整体实力;主观指标为该学科的“学术声誉”,反映该学科的学术成就对社会的贡献情况以及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本刊编辑部供稿)